

在父亲的泪水中告别印尼

我出生于1933年12月,今年已经87岁了。1951年11月,18岁的我告别父母亲人,告别南化学校的师长们,从印尼万隆,经由雅加达、广州等地辗转到厦门,我们是印尼首批回中国的学子。当时印尼政府逼着我们承诺:此去中国,就意味着放弃印尼国籍,再也不回印尼。

父亲是反对我回国的,他说是因为家里的纺织厂需要我接管,但

我知道,父亲是舍不得我啊。父亲从万隆送我到椰城雅加达,一路送一路哭。一直到上了船,我还看到父亲在岸上抹着眼泪。自此一别,我再见到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,弟妹自小离别再见时已颇为生分。回首往事,我也舍不得亲人,但年幼的我,激情燃烧,如果回到过去再做一次选择,我想我还是会只身回国,这与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系。

曾是印尼华校的风云人物

在印尼万隆南化学校读书时,我们接受热爱中国的教育,唱着爱国歌曲。在中国的纪念“五四运动”、庆祝建国等活动,我们在印尼也同期举行。在内心深处,我们是向往着回到中国的。

因此,南化学校在当时被看成是“共产党的学校”,印尼当地的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经常到学校骚扰,我们组织起来保卫学校。有的老师被迫害,我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去探监,机关枪就架在旁边,不让我们

进去,我们是强行闯进去的。没有老师上课了,我们自发维持学校秩序,还给低年级学生代课。

那时候印尼的局势比较复杂,我们支持印尼的民族解放运动,宣传“我们是中国人,不入印尼籍”,这些是为当时印尼政府所反对的,而且还要与国民党的势力做斗争。我表现突出,算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吧,学校特地组织人力暗中保护我。我还参加了南化歌咏团,在万隆小有名气。

在厦门双十中学学习及工作

1952年3月,我插班进了厦门双十中学。由于文化基础较差,我得加倍努力读书,才能赶上去。当年暑假在夏令营时我就加入了青年团,不久被选为班级团支部书记,高中毕业时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。

1954年,台湾国民党飞机经常骚扰轰炸厦门,厦门所有的高考生都到漳州一中进行高考。那天上午考语文,我正聚精会神答卷,突然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,就在我坐位的前面,我赶紧站起来报告给另一位监考老师,他劝我把倒地的监考老师扶到医务室,他说考场上不能没有监考老师。可是医务室在哪儿呢,我是第一次到漳州一中啊……等我赶回考场,满头大汗,时间也就耽误了不少,试题来不及做完,尤其是作文没写。高考发榜时,我果然落榜了。高考落榜,也意味着孤身一人在厦的我,无处可去。好心的李永裕校长鼓励我留在双十中学抓青年团工作,担任团委会书记。因此,

从1954年9月起,我就成为了双十中学的老师。那时,由于形势需要,我们组织纠察队,夜间站岗巡逻;敌机空袭时,组织师生疏散进入防空壕;在夏季,组织参加抗洪救灾,抢救夏粮。1956年,组织青年突击队,参加修建鹰厦铁路青年段等。当时,学校缺政治教师,我受命兼上政治课,还当过班主任。我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,得到市有关部门的好评。1956年暑假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56年秋,双十中学改为公办,校舍紧缺,基建资金不足。李永裕校长、陈实总务主任知道父亲曾从印尼汇了1万元人民币给我,存在银行作为生活费用,就动员我捐款。我起初心里很矛盾,担心生活无着落,最后被说动了,将这1万元人民币捐给了双十中学。

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,我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,赴北京参观全国教育展览会。



父亲再次动员我回印尼

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着我。1959年厦门市委、市政府保送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书,在政教系哲学专业,属调干带薪学习。

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,我担任校团委统战干事,负责归侨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工作。每逢寒暑假联合北京数所高校侨务工作者,共同举办侨生联欢活动,深受侨生的欢迎。1961年国庆,父亲参加万隆华

侨回国观礼团,我正在北京读书。陈毅接见华侨回国观礼团,我也沾了光,那时候我那个激动呀。父亲回印尼,我送到广州,一路上父亲一直在动员我回印尼,接班管理纺织厂。我当然是不为所动。

说到印尼亲人,我的弟弟妹妹1960年回到集美侨校读书,上山下乡时还去了永定、长龙。1970年,他们要去香港定居,动员我一起去,我仍旧选择留下来。

中国,我回来就不再离开

□邱章开(口述) □林希(整理)

在厦门二中总结出英语与足球“两个特色”

1963年大学毕业,我被分配回厦门,安排在厦门二中任教,先后担任团委书记、教研组长、工会主席、政教处主任、校长和党支部书记。

文革期间,我被戴了5顶帽子:保皇派、反动学术权威、里通外国的间谍、漏划的走资派和假党员(有人污蔑我的党员是捐款1万元“买”来的)。

文革后,恢复高考。由于我对政治科教材和国家形势把握得比较准,所以,我编写的政治科复习提纲质量比较高,考生凡读过我编写的复习提纲政治成绩都很好。厦门二中以外的

考生闻讯来找我辅导,这以后省教育厅调我去参加编写政治科教材复习纲要。

在厦门二中工作期间,我曾与老校长陈碧玉、陈和国老师等办英语教学试验班,吸收上海外国语学校的好经验,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,效果很好。

1982年,根据厦门二中英语教学试验班的办学模式,我协助市政府创办厦门英语中学。厦门二中提供校舍、师资、设备、图书等,尤其重要的是从厦门二中调去了一流的教师,作为教学骨干,相当于整个高中部都给了英语中学。英语中

学后来改名为外国语学校,可以说,厦门二中为创办厦门外国语学校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根据多年经验,我总结了厦门二中办学的“两个特色”,即英语特色和足球特色。鼓浪屿有英华足球俱乐部的底子,有踢足球的氛围。我跟鼓浪屿的6所小学说,你们每所学校都应该成立足球队,可以到二中来踢足球,我们免费提供场地,还提供茶水等服务。而二中的每个班都有1支足球队。就这样,要不了几年,鼓浪屿的足球苗子接连不断地涌现,二中不愁没有好苗子可挑选。英语和足球,直到现在都是厦门二中的两个办学特色。

退而不休老有所乐



1986年初,我被调到市人大任教科文卫委主任。1994年3月退休,继而又参与了市教育基金会、市老年人体育协会、

市计划生育协会、市归侨知识分子联谊会等工作。

1995年初,我在市老体协工作期间,在全省率先组织开发老年气排球运动项目。那几年厦门市老年气排球队几乎逢赛必赢,威震八闽大地。2003年,华东老年气排球邀请赛,我拉了一批赞助款,率领厦门市队赴浙江省参赛,获得第三名。我本来就爱

好体育运动,亲自上阵,当“二传手”,还通过培训成为“国家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”,担任思明区老年气排球队教练。

1995年,我以厦门老体协的名义,组织举办了一次国际华人(华侨)老年篮球邀请赛,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、香港、台湾、厦门等8个队参赛,在厦门市工人文化宫、蓝领体育俱乐部举行,比赛进行了6天,友好、欢快、激烈。我的北师大校友、香港同胞邱季端赞助了这次比赛。

应邀来参赛者,许多既是篮球爱好者又是企业家,他们边打球边进行商贸活动。在与厦门队联谊时,用闽南话交流,唱华语歌曲,亲情、乡情、友情充分交融,场面十分感人。

印尼是我的第二故乡

退休后,我4次回印尼,1996年、2001年、2006年和2008年。为什么用“回”,印尼是我的第二故乡,在印尼国土,父母养育我长大,南化学校的师长培育我成人。其中,2001年我与吴文华一起回印尼,进行华

文教育调查,写了《万隆华文教育调查报告》,得到市人大领导的重视,还被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刊登了。2006年,南化、清华校庆,南化学校元老、主要创始人杨望东老师,鼓励我一定要回母校参加校庆六十周年,并

把我的文稿《情系南化》转交给南化校庆筹委会。参加这两个校庆我感触很深,他们办华文教育的奉献精神 and 艰苦卓绝的工作精神,实在是很了不起,令人钦佩。

我年纪大了,有许多事自己都记不清了,不过历史会记得的。

邱老师是位诙谐的老大哥

谈起邱章开老师,厦门万隆同学会 Cempaka 歌队的歌友们七嘴八舌,他们说:“邱老师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,但在我们这里,他就是位诙谐的老大哥。”

邱老师担任厦门万隆同学会顾问,同学会成立27年来,他一直关心指导和积极参与校友会的活动。拿他自己的话说,他在歌队找回了久违的青春,捡回了第二故乡的方言,使他得以在回印尼探亲时用第二故乡方言和亲友们交流,进一步拉近亲情。

邱老师常跟我们回忆起少年时代在侨居国念书时,参加学校歌咏团,高唱《黄河大合唱》到各地宣传演出的激动场景。他每周三来

Cempaka 歌队唱歌时,总是哼着歌走进来,他常说每天唱歌会健康长寿。他把歌友们称为“小妹妹”,爱护有加,也常常诙谐幽默谈论往事,给歌友们带来欢声笑语。

他热爱 cempaka 歌队这个集体。深知作为群众组织,经费来源有限,便数次主动献爱心捐资搞活动,如印刷歌队

《纪念专辑》、聚餐品尝黄姜饭,他都乐于承担全部经费。

2012年邱老师八十寿辰前夕,得知歌友们准备为他做寿后,他豪迈地说,“我来请客!”生日当天,邱老师携夫人蔡老师来到现场,歌友们定制了三层生日蛋糕,送上了80张他在厦门万隆同学会及 CEMPAKA 歌队的照片,欢歌笑语,老寿星和歌友们快乐与共。



2012年厦门万隆同学会 Cempaka 歌队为邱老师庆贺八十寿辰